

另一个希腊

阮 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另一个希腊

阮 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个希腊/阮炜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8
ISBN 978 - 7 - 5426 - 3296 - 8

I. ①另… II. ①阮… III. ①希腊—概况
IV. ①K954.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6924 号

另一个希腊

著 者 / 阮 炜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 //www. sanlianc. com

E-mail: shsanlian@yahoo. com. 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19.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296 - 8/C · 366

定 价 / 38.00 元

目 录

1	导 言
7	第一章 东方化革命
7	一 引言
10	二 非原生的希腊文明
13	三 埃及神庙里的希腊留学生
18	四 希腊艺术的东方化
21	五 希腊神谱的东方渊源
26	六 其他希腊神祇的东方渊源
30	七 希腊文学中的东方元素
33	八 希腊哲学中的东方因子
39	九 巴比伦、埃及科学对希腊科学的影响
44	十 字母、“书”和书写技术的舶来
46	十一 希腊铸币源于西亚
48	第二章 “希腊化”中的“化希腊”
48	一 引言
52	二 希腊人对东方的入侵与占领
56	三 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尴尬
60	四 地缘自然环境与希腊文明的品性
66	五 希腊罗马宗教傍东方宗教
73	六 希腊哲学概念傍东方宗教

- 77 七 帝国秩序对新文明崛起的作用
- 79 八 个人主义对希腊文明意味着什么
- 82 九 希腊罗马哲学被收编于叙利亚宗教
- 85 十 希腊罗马文明被叙利亚化
- 89 十一 西方文明的叙利亚根性
- 93 [链接] “宗教”一词的误导性
- 95 第三章 早期希腊氏族民主
- 95 一 引言
- 98 二 早期希腊的氏族社会特征
- 100 三 为什么说早期希腊氏族民主仍存?
- 105 四 什么是巴赛勒斯制?
- 107 五 结语
- 107 [链接 1] 氏族、部落的起源及特征
- 109 [链接 2] 雅典巴赛勒斯制的废除为什么相对温和?
- 111 第四章 早期希腊头人制
- 111 一 引言
- 112 二 “不能人人都是王者”应如何解读?
- 116 三 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对头人的制约
- 120 四 头人与平民的紧张关系
- 123 五 早期希腊政制是头人制而非王制
- 126 [链接 1] Basileus 是“头人”还是“国王”?
- 128 [链接 2] 希腊是否有过“神授王权”和“中心王朝”?
——与顾准先生讨论
- 128 一 希腊是否有过神授王权?
- 130 二 神授王权论有何根据?
- 132 三 神授王权论为何站不住脚?
- 136 四 顾准先生为何提出神授王权论?

137	第五章 华夏希腊早期国家比较
137	一 华夏世界为何早早丧失了氏族品性?
138	二 血缘与政治权力的“同层同构”
141	三 血缘与政治权力“同层同构”的原因
144	四 希腊血缘关系为何容易松动?
146	五 希腊血缘关系能淡漠到何种程度?
148	六 华夏世界为何早早开出了超大型共同体?
150	[链接 1] 放逐并非仅见于希腊
152	[链接 2] 印度政治整合为何难于中国?
153	第六章 当希腊人遇到希腊人
153	一 引言
154	二 地缘自然环境与好勇斗狠的性格
156	三 伯罗奔尼撒战争与西西里远征
159	四 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人的窝里斗
160	五 雅典帝国主义
164	六 大邦吃小邦
166	七 雅典吃盟邦
170	八 结语
170	[链接] 弥罗斯比与长平:小巫见大巫?
174	第七章 苏格拉底审判背后的政治
174	一 引言
177	二 苏格拉底的贵族弟子
183	三 审判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187	四 柏拉图对关键信息的封锁
192	五 审判背后的血腥政治
197	六 政治报复原本可以避免?

200	[链接 1]	“世俗的圣人”苏格拉底
203	[链接 2]	苏格拉底的“美德”与“神魔”
209	第八章 “哲学”为何产生在希腊?	
209	一	引言
210	二	希腊哲学与“轴心期突破”
213	三	希腊哲学是一种有缺陷的“突破”
217	四	哲学诞生的地缘自然环境
221	五	航海生活方式与哲学的兴起
225	六	民主政治与哲学的兴起
228	七	从地缘格局看希腊与中国
231	八	从自然环境看希腊与中国
236	九	结语
237	[链接]	心学的“个人价值”与希腊的“个人主义”
240	第九章 从角力拳到太极拳	
240	一	引言
241	二	奥运会为何起源于古希腊?
243	三	古代奥运比赛是如何举行的?
247	四	古代奥运会与古希腊同性恋
253	五	古代奥运会与现代奥运会的异同
257	六	不同于现代体育的名次概念
260	七	残忍的角力拳
263	八	古希腊何以能产生角力拳?
266	九	从角力拳到太极拳
269	[链接 1]	神圣赛场上的刀光剑影
270	[链接 2]	凶狠的古代拳击
272	附录 “是”与“在”	

272	一	引言
273	二	对论辩的回顾
276	三	自然语言用多种语法形式表判断
283	四	为什么应区分“是”与“在”?
286	五	“存在”、“是”、“本质”、“实体”
290	六	结语
292		地图
295		本书地图出处
296		大事年表

导 言

据说,市场经济时代是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就是说在 market 价值的宰制下,传统意义上的思想、主义或信仰都不再起作用了。然而施特劳斯主义在 21 世纪中国的传播很可能是个例外。或许因为市场经济信奉优胜劣汰的法则,或许也因为 20 世纪中国搞了太多革命和运动,所以施特劳斯主义跟一部分读书人有很强的智识亲和性,传入中国以后不仅未见被后意识形态化,反而旗下皈依了不少信徒。这些人当中不乏虔信者。

在施特劳斯“教诲”下,这些虔诚的读书人信仰“自然权利”的神圣性,信仰“自然构成的等级秩序”的不可变更性。在他们看来,丛林原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正如狼吃羊乃是前者行使其“自然权利”那样,人类社会不同阶级或集团间也存在一种捕食与被捕食的“自然秩序”。好在施特劳斯的追随者多为“古典学”或“古典政治哲学”学生,至少目前看来,尚未将其自然权利论和自然秩序观运用到国际关系和文明研究领域(其实即便施特劳斯本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他那杀气森然的政治哲学径直用到国际关系上来)。但是如果将施特劳斯主义式“古典学”或“古典政治哲学”的逻辑稍加推演,几乎不可能不得出这一结论:不仅在阶级关系而且在国际关系、文明间关系上,也存在一种捕食与被食的“自然”格局。这里,发达国家、西方文明是捕食者,发展中国家、非西方文明是被食者。什么社会流动性、革命与变革、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动,统统是伪命题。

有挑战就得应战,甚至不妨用一用施特劳斯的追随者们喜欢用

的语言。

人类社会本质上果真跟自然界无异？其实即便灵长类社会也不乏其“自然秩序”，这就是革命和变革。年轻的黑猩猩们时刻紧盯着王位，一旦猴王年老体衰，便会一次又一次地发动革命，直到将它赶下台去。对黑猩猩来说，推翻不称职的当朝者乃天经地义，或者说导致社会结构变动的“社会流动性”或革命性、开放性是其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不仅意味着在野者有推翻当朝者的权利，更意味着个体乃至群体具有一种内在的进化性。人是灵长类，据说是黑猩猩的亲戚，基因里早已刻录着革命性、变革性。这就解释了人类为什么一直在变化、在发展、在演进。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中国、埃及、西亚、希腊罗马的历史，以及中世纪以降的西方历史——无不充满了革命、改革和文明间权力关系的深刻变动。

即便在后北京奥运的今日，中国也仍处在发展过程中，西方霸权仍十分强势。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只看得见狼之捕食性，却看不见猩猩的革命性。这些人对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熟视无睹：与施特劳斯主义一脉相承的美国新保守派对伊拉克战争、巨大的贫富分化乃至全球金融风暴、经济危机负有极大的责任。他们也看不见施特劳斯式“古典学”或“古典政治哲学”与施特劳斯主义纠缠在一起，已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施特劳斯的追随者是憎恶自由的（尽管施特劳斯本人似乎并非如此）。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憎恶自由？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自由理念真的意味着“虚无主义”（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一种否定一切价值的绝对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否可能，在实践中是否存在？抑或这种自由主义实乃子虚乌有，仅仅是一种出于政治动机的虚构？曾为马克思主义同道的自由主义是否因为首先在西方有了热闹呈现，便应视为一种西方霸权理念而加拒斥？现代人所享有或向往的种种自由难道不像现代性本身那样，是作为整个人类文明而非西方一家长时期演进的结果？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便出现了大量自耕农（同奴隶和农奴相比，自耕农所享有的经济社会权利之多堪比现代人），自由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张扬？没有自由的张扬，何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自由的推进，哪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们走上历史的前台？为什么在罗马帝国时期（而非希腊“古典”时代），西方世界的奴隶获得自由，而中世纪末以降，西欧乃至中欧的农奴又得到了解放？为什么 17 至 19 世纪发生了历次欧美革命，20 世纪更发生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什么在所有这些革命中，自由无不有了大踏步的推进？为什么即便在革命传统相对薄弱的印度，公民的权利也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尊重，根深蒂固的种姓制也正在消解？凡此种种难道不意味着，即便近几十年激进形态的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引起了一些问题，自由仍然是一种全球趋势？

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究竟有何具体内涵，这种自由究竟有何具体主张？即便言论界对此已是耳熟能详，再说一遍也无妨。现代自由主义主张充分保障公民财产权，主张法治、分权制衡、政党政治、代议制度、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普选权当然也是一种现代自由。作为一种极重要的政治权利，普选权在全球性民主化进程中姗姗来迟，但及至 1975 年西班牙实行共和制，西欧最终实现了全民普选。近年来非西方国家也在迅猛追赶，连君主制的不丹也立宪了，而君主立宪制的尼泊尔更进一步，共和了。

应当注意的，是西方之所以有施特劳斯主义，乃因为在一些西方人看来，现代人享有的自由已经太多，或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角度看，个人所应尽的义务已经太少。但自由不等于无法无天，所以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但这种争论的焦点并不是要不要自由。事实上，最激进的自由派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认自我约束的必要性。同样，最激进的保守派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否认现代人应享有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否则，1990 年代以来新一波保守主义为什么自诩为“新”保守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争论的实质是：个人所受的道德约束甚或法律约束是否太少，少到使社会不能自我维系。

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国人应否跟在西方人背后亦步亦趋，不考虑国情，抱怨自由太多，抱怨自由是现代性的所有问题乃至现代性本身的罪魁祸首？我们是否已能享受这种奢侈？西方左翼的某些倾向，例如反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极左思潮，当然应该拒绝，但这是否构成了热烈拥抱施米特主义和施特劳斯主义的理由？我们为什么无视它们与新保守主义的血缘联系？难道还没有看够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维兹之流穷凶极恶的嘴脸？在极左思潮早已不是思想主流的国情下，在政商勾结，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既得利益永远强势，弱者的利益诉求仍然不能得到有效表达和保护的国情下，藉着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对自由予以一种隐讳或者暧昧的打击，有必要吗？对于这些问题，施特劳斯的追随者们是不愿意思考的。

中国人接触西方古典文明，当始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时为吸引儒生士大夫入教，也向他们推销一些希腊罗马学问。但即便这种不问也没有真正打动中国读书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泰西之学”比中土学问高明。及至清末，中国读书人始才认真看待“西学”，其中包括西方的古典学。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人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一切，激情澎湃地翻译介绍一切西方思想，对希腊罗马文明也有了初步的认识。

然而回头看去，我们在西方古典学的引进过程中，总的说来是热情有余，思考不足。自晚清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其间我们经历了两次译介繁荣，即五四时期和最近三十年，但距离开启一种中国视角的古典学研究仍十分遥远，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知仍相当肤浅。这就是为什么施特劳斯式“古典学”在一部分读书人当中会产生信仰效应。

按照施特劳斯式“古典学”从业者的说法，引入这种学问就是要给低迷的中国古典学问打气，就是要提升中国的古典学问，然而，事实上，施特劳斯式“古典学”并不能代表包括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西亚、拜占廷）哲学、文学、历史、社会、宗教、神话、艺术、教育研究在内的西方古典学；即便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至多也只是是一个分支。考虑到五四以来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人

在铺天盖地的反传统思潮中坚持独立的思想，锲而不舍地继承发扬中国古典学问，施特劳斯式“古典学”究竟能否起到加强中国古典学问的作用，就更是疑问了。在西方话语仍十分强势的情况下，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无论如何，施特劳斯式“古典学”或“古典政治哲学”已吸引了一大批读书人。他们相信这就是西方古典学本身，他们中的一些已然成为施特劳斯主义的信徒，也就是说施特劳斯式“古典学”或“古典政治哲学”已经成为一种信仰。这从某些虔诚追随者所写的深情款款的“古典学”或“古典政治哲学”文字中是不难看出的，从他们中某些人在某些文章中一字不漏整段照抄施特劳斯原话据为己有，也是不难看出的。但这种“古典政治哲学”有“古典学”之名，却没有古典学之实；有“政治哲学”之名，其政治意图却十分暧昧。

为什么说是暧昧的？图书市场热销的“古典学”或“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固然代表了一种西方保守主义思潮，或者说是施特劳斯主义的一种信仰式转述，却缺乏一个明确的打击目标。是否要向西方自由派或自由主义左派发起攻击？显然不是。这从只有大量西文著述被译成中文是不难看出的，从信徒们写文章所用语言多为汉语也是不难看出的。是否要对中国的极左思潮实施最后的打击？也很难说。极左思潮大体上已偃旗息鼓。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既然如此，施特劳斯主义、施特劳斯式“古典学”或“古典政治哲学”究竟有没有一个打击对象？吉诃德们披挂上阵，挥舞长矛，但何处还有风车可刺？

其实，即便是施特劳斯式的“古典学”也并非不可以引进，甚至可以说带立场的引进是不可能的。但在当今中国学术很大程度仍然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国情下，尽可能用一种中性的风格来译介西方理论，是学人的责任。如果能够做到以一种中性的风格来引进和介绍西方思想，哪怕所引进的是施特劳斯式“古典学”，也算是引入了一种有用的学术资源。但如果像拉姆斯菲尔德一类新保守派那样把施特劳斯式或“隐”或“显”的“教诲”当作绝对真理来信奉，就会使易于冲动的读书人把一种可疑的学问误作古典学本身，

就会制造盲信。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带着问题意识,用一种更为中性的态度来介绍、分析、批评和利用西方人的学问。如果说晚至 1980 年代,学界仍在大规模引进西方理论尚情有可原,毕竟中国闭关锁国了几十年,但到了今天,到了经济迅速崛起但思想上仍沉沦于自我殖民难以自拔的今天,这么做合适吗?做西方古典学研究或其他人文学研究,如果一开始便无条件地认同西方思想的真理性,而不是从一种主体性立场出发,将其作为一个个对象来研究,然后决定取舍,岂不可悲?如果不努力寻找、建构一种独立的立场,而是一如既往地学而不思,甘当一种可疑“教诲”的传声筒,把它当作一种终极的真理来接受、来信仰,岂不可悲?

以此故,应努力认知那另一个希腊,一个我们不知道、知之不详、不愿意知道的希腊。

第一章 东方化革命

一 引言

大约在西元前 8 世纪至前 2 世纪，西亚地中海世界出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态：一直位处边缘希腊人开始从爱琴海区域崛起，表现出一种爆发性的创造活力，几乎在古代人类生存的每一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参阅书尾地图“古希腊世界”。）

希腊人开出了精密的科学。希腊人当中兴起了精致的“哲学”。希腊世界出现了在人类古代最激进的民主制度——同大河流域普遍盛行的君主制相比，古代希腊常见的“寡头”制（其实，这种制度可谓“民主集体制”，但在实际操作中比大多数现代民主政体更民主）也十分民主。^① 希腊人不仅发展出了极具效力的军事技术和战法，而且在西方历史上首创了悲剧和喜剧等文学形式。希腊人还开出了精美的音乐和绘画艺术。此外，希腊人不仅修建了大量石结构的庄重、典雅的神庙，而且雕刻了大量造型优美、栩栩如生的汉白玉塑像，更制作了大量图案精美的陶瓶。直到今天，希腊人的这些成就还在让现代人感叹。

这里要问的问题是，希腊人何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前 8 世纪以降希腊经济的全面复苏无疑是一个必要条件，但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同样重要甚至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起作用？

^① 见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第五章第四节“斯巴达：‘寡头制’污名下的民主”。

当然有,那就是两河流域和埃及更古老的文明对希腊的长期影响。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崛起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此因素作用之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西方主流思想界却不太承认东方影响,或有意无意淡化这种影响。受西方主流思想界的误导,中国读书人对希腊文明的这一面也视而不见,或很不重视。

不过近几十年来,西方古典学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本身还有一些更深更远的源头,那就是西亚和埃及。但至少目前这种人还是少数,英国左翼古典学学者马丁·伯纳尔写出皇皇三大卷《黑色雅典娜》,就是要纠正旧认识。需要强调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在欧亚大陆,没有一个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明不是原生文明(在萌生阶段未受其他文明影响、完全自发形成的文明),或在原生文明基础上崛起的后发或次生文明。尽管如此,在长达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西方主流言论界不承认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即希腊文化受到了西亚和埃及的深刻影响;没有这一影响,便没有今天的西方文明。

其实,18世纪前尚未工业化时,西方人仍很谦卑,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也相对客观。但从18世纪下半叶起,在启蒙思维尤其是新潮“进步”观影响下,欧洲人中出现了一个新动向,那就是,开始拒不承认自古以来欧洲人一直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西方文化的一大源头——希腊文化——曾经受到埃及和西亚文化的结构性影响;如果没有这种影响,希腊文明根本不可能成其为希腊文明。^①这个事实本来是明摆着、无需证明的,从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的僧侣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一直到启蒙运动早期的思想家,西方人一直没有否认这个事实。可是及至启蒙运动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发达了、“进步”了

①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USA), 1987, pp. 177-181; pp. 196-204.

的欧洲人开始拒不承认希腊文明对西亚和埃及文明的承继关系。^①

如果说此前不久,欧洲人出于当时反宗教愚昧和推翻封建专制的需要,热烈炒作一个开明、宽容的中国,那么拒不承认西方文化之祖希腊文化从原始时代起便受惠于东方,则更多是因为文艺复兴以来诸多“进步”(包括当时语文学[philology]界的重要发现:欧洲各地的语言与多数伊朗和印度语言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即原始印欧语,或者说这些语言全都属于一个共同的“印欧语系”)所导致的自我膨胀。从启蒙运动后期开始,西方人的数典忘祖持续了近两百年,在19世纪末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顶峰,出现了一种畸形、变态的极端表现形式,这就是纳粹宣传机器所鼓吹的臭名昭著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

如今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已成为过街老鼠,但西方中心论思维却仍在作祟,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表现在西方人对希腊文化起源的看法上。及至1960年代,还有西方学者认为,在前8至7世纪,希腊文明方方面面的创新大体上都是希腊人独自完成的,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蜷藏在滔滔大海和小亚细亚崎岖山峦背后的偏远角落”;^②即便古代埃及和西亚的实用科学、数学、天文学知识对希腊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毋庸置疑,那也不是因为希腊人直接从古埃及人和西亚人那里吸纳了这些知识,而是因为他们从犹太人那里吸收了这些知识经改造、转手之后的形式。^③迄于今日,诸如《图示剑桥古代希腊史》(1998)一类关于古希腊的流传甚

① 恰恰也在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也与启蒙运动有关,即进步了、发达了的欧洲人对先前羡慕不已的中国文明的认知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中国文明一下沦为“进步”的欧洲的反面,沦为愚昧、专制、残暴、落后的代名词,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通过传教士所认识的中国一直是孔子人文主义熏陶下的一个世俗、开明、宽容、和平的国度,与专制、愚昧、狭隘、不宽容,宗教战争连绵不断的欧洲形成了鲜明对比。

② Chester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1100 - 650 B. C.,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unlisher), 1961, pp. 194 - 195. p. 199. pp. 200 - 201, 以及全书各处。

③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全书各处。